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黄花岗起义



## 一、山雨欲来

1910年，黄花岗起义爆发的前一年。

这一年，中国的社会呈现出空前的大动荡。清政府的财政已经濒临绝境。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同各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大量的赔款使它的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为了挽救日趋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政府只有拼命挣扎。它在大量举借外债的同时，对国内人民横征暴敛，往人民头上猛加种种苛捐杂税。旧税之外又加新税，巧立名目，层出不穷，办学堂，设警察，修铁路，查户口，订门牌，等等，加捐派税，致使下层劳动群众叫苦不迭。他们为了生存，只有起而反抗。这种自发的反抗斗争，到1910年，就由1909年的149次增加到266次，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抗捐抗税和抢米风潮。这一年发生的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和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都是震动全国的重大事件。

抗捐抗税斗争，由来已久，波及很广。1910年，这种反抗斗争达到了高潮，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

莱阳地处山东中部，属低山丘陵地带，土地贫脊，农民生活十分穷苦。虽然如此，他们也逃不脱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正如一位农民所说：养一只鸡要捐多少钱，养一条狗要捐多少钱，生一个孩子也要捐多少钱；种地瓜要纳税，种花生要纳税。这个捐，那个税，数也数不清，记也记不住。巡警、衙役下乡催缴捐税时，乘机敲诈勒索，农民稍有反抗，轻则罚款，重则法办。农民敢怒而不敢言，积怨越来越深。

1910年春，老天也不作美，莱阳一带严重春寒，没法播种，秋收无望。奸商乘机囤积粮食，农户十之八九缺粮。当地农民多有办社仓的习惯，就是各家在秋收后，自愿拿出一部份粮食，集中放在一个仓里，以备荒年时食用。这一年的春天，政府要这一带的农民补交人口税和牲畜税，柏林庄的农民就想用社仓的粮食来缴纳。谁知社仓的积谷早已被把持社仓的劣绅吞食。消息传出，群情激愤。5月21日，西北乡七百多饥民拿着粮袋子蜂涌到县衙门前，要求开仓放粮，免除捐税。虽然不久散去，但民愤没平。6月11日，农民又集合七、八千人，将劣绅王景岳的房屋烧毁，以泄民愤。7月2日，新任莱阳县县长派兵前往柏林庄，捉拿抗捐领导人曲诗文，群众闻讯，奋起阻拦，清军开枪，打死数人。被激怒的农民奋不顾身，同清兵搏斗。柏林庄的斗争，得到全县农民的声援，很快聚集了15万多人，自备干粮，冒着大雨，齐集在九里河滩，等待着更严峻的斗争。7月13日，大批清军开往九里河，向农民开炮轰击，打死农民300余人。14日，清军继续向柏林庄进攻，所到之处，狼烟滚滚，农民死伤者竟达1300人。

我们再来看看抢米风潮。20世纪初，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五省的饥民，向地主大户抢米的风潮，连年发生。1910年春，湖南由于粮食外运和商人囤积，粮价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大批饥民涌向长沙城内，老弱冻饿死在街头的每天都有数十人。由于粮价一日涨几次，4月11日这一天，竟有全家一起投水自杀的惨剧发生。第二天，米价跌落到每升七十文，傍晚又涨到七十六文。这时恰有一个老妇拿了七十六文到一家米店买米，老板剔出其中两文小钱，说不能用，老妇只得回家换了两个，再来时，米价又涨到每升七十八文，老妇愤怒地向老板讲理。恰在此时，有两个泥木工人出钱买米，米店竟向他要每升一百文。两人大骂巡抚，被赶来的警

察捕去，围观的群众愤而捣毁了米店。

4月13日，巡抚岑春煊派人前往城南查办。来人被群众痛打一顿，逃往城内。愤怒的饥民追到城内，涌到巡抚衙门外，要求政府压低米价、释放昨日被捕的泥木工人。群众越聚越多，岑春煊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十余人。次日，长沙全城罢市。一万多群众再次齐集巡抚衙门前，岑又下令开枪，群众怒不可遏，纵火焚烧了巡抚衙门。岑春煊在慌乱中逃命。

无论是抗捐抗税斗争，还是抢米风潮，1910年发生的次数最多，波及的地区也最广。全国已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

20世纪初，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创建中国同盟会。同盟会在宣传鼓吹革命的同时，还在广东、广西和云南边界多次发动武装起义。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同广大下层群众的反抗斗争形成两股革命潮流，相互激荡，有力地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

1910年初，革命党人又在清朝的军队中发动了广州新军起义。

新军是指清朝末年编练的近代化陆军，新军军官中有一批思想比较开明的知识份子。广州新军是从广东沿海招募来的，一些革命党人也乘机应征。他们在军中传播革命思想。1909年夏，同盟会南方支部成员赵声、朱执信、倪映典等决定在新军中进行联络，相机发动起义。

2月9日正是旧历年除夕，新军士兵放假进城，两士兵为刻印图章事同老板争执时，同路经此处的警察发生冲突，两名新军士兵被捕，进城的新军闻讯，前往警察局要求放人。人越聚越多，警察在门前严阵以待。清官员见此情景，前来劝解，将被拘士兵放回。新军士兵听说被拘伙伴被打伤，群情激奋。第二天，恰值大年初一，士兵们携带木枪、棍棒进城，见警察就打，清广州官员急忙下令将城门关闭。

倪映典仓促宣布起义，三千余名新军在倪的率领下向城内进发。清水师提督李準率军出城迎战。两军在东门外相持。清军诱杀倪映典，起义军大乱，待到再组织进攻时，由于兵心涣散、子弹缺乏、伤亡惨重，终于溃散。起义失败后，部份新军士兵被遣散回家。

## 二、共图再举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多数逃到南洋避难。南洋的革命党人经历了多次起义的失败，许多人产生了悲观情绪。

孙中山于1910年7月由美国经日本来到槟榔屿。孙中山敏锐地估量了新军起义失败后的形势，认为时机大有可为。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下，孙中山决定破釜沉舟，再图大举。

1910年11月初，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赵声、胡汉民应孙中山的邀请，来到槟榔屿，共同商量再次组织武装起义的计划。他们三人都被目前种种困难所困扰，情绪不高。孙中山问他们下一步有何打算，他们都摇头叹息，相对无言。孙中山却从容镇定，对革命前途乐观。他耐心地安慰大家，说：一次失败有什么可以气馁的，我们过去失败过多次，比起今日，其困难更大。黄兴、赵声、胡汉民在槟榔屿看到亡命海外的同志穷困潦倒的境况，便对孙先生说：这里的同志，目前的生活费用都难以为继，哪里还有钱作活动经费呢？孙中山热情地鼓励他们说：“今日吾党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赵声接着说：如果事有可为，则非需数十万元不可。孙中山当即表示：如果众志成城，财用一层，吾当设法。他自告奋勇，担当筹措款项的艰巨任务。孙中山的革命热情，强烈地感染着在坐的每一个人。大家表示愿意支持孙先生再次组织武装起义的主张。

孙中山亲自发信，约集南洋各埠及国内部份同志来槟榔屿开会。各地同志接信后，纷纷前来。11月13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同盟会的骨干在槟榔屿打铜街一二号党部举行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及当地党人黄金庆、吴世荣、熊玉珊、林世安，李孝章、邓泽如，还有国内东南各省代表谢逸桥、谢良牧、何克夫等。会议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第一，款项的筹措。孙中山十分重视这一工作，他反复强调筹足经费的重要，说：“款项多一分，则筹备足一分，吾党不乏热心之士，前此力分而薄，且未先事为备，每有临渴掘井之患；今举全力以经营，鉴于前车，故为充分款项之筹集。事济与否，实全系之。”大家都赞成他的意见，认为筹足款项是关系成败的头等大事。会议决定先筹足十万元大款。

第二，再次发难的地点选在哪里？新军起义失败不久，孙中山考虑下一步行动时，就曾给黄兴写过两封信，提议再次发动武装起义的地点还应该选在广州。黄兴原来也有一番考虑，他曾领导过云南河口起义，在那里还有一部分力量，况且云南地处西南边鄙，清军难以进攻。所以打算再次在云南发动起义。接到孙中山先生的信后，他同赵声反复商议，同意孙先生的意见，他在复信中说：“省城（指广州—编者）一得，兵众械足，无事不可为。”9月5日，孙中山写信给友人咸马里，说：“大多数领导皆主张一天工始即攻取广州，而极不愿意采取其他行动。我亦认为此城自始即为我们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且先攻此城比之后来攻取将远为容易。”由此可见，在这次会议前，关于发难地点，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是经过反复斟酌的，这次会议就把广州作为再次发难的地点确定下来。

第三，队伍的组织。大家一致认为，革命党人在广州新军中有较好的基础。起义失败，尽管力量遭受一定的损失，但赵声曾经担任过标统（相当团

长)的新军第二标和第三标(相当于团)一营中的革命力量依然保存着。所以,会议决定再次起义依然以新军为主力,同时联络巡防营和民军。这次会议还吸收以往起义失败的教训,决定挑选五百名革命同志为选锋(敢死队),负责发难。

第四,攻取广州后的军事计划。对此,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决定攻下广州后,即由黄兴率领一部份军队,经湖南到湖北。因为黄兴曾在湖南创办华兴会,在两湖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本人在这一带也颇有声望;赵声率领另一部份军队经江西到南京。因为赵声曾担任过南京新军的统领,至今他同南京新军的感情还很深。待到两军分别到达湖北和南京后,长江流域的各省革命党人便发动军队响应,然后会师北伐,直指清王朝。

会后,孙中山即派赵声回香港,联络广州新军,派黄兴、胡汉民、邓泽如在南洋筹款,他自己则暂留槟榔屿,并立即致函美国、加拿大、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缅甸等各党部,要求他们进行募捐。

广州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

### 三、筹措经费

兵马未动，粮秣先行。组织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将需要一笔巨额的经费。它包括购置、运送枪支、子弹，参加起义人员的车船费、生活费及各项活动经费。檳榔嶼会议汲取前几次起义多因款项准备不足，临渴掘井而导致失败的教训，决定全力以赴，筹措经费。

孙中山指派胡汉民负责东南亚地区的筹款工作，邓泽如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地区负责筹款。会议结束后，他们便分赴各地，在各界爱国华侨中进行筹款活动。

胡汉民于12月初在东南亚各埠活动，奔忙了十几天，所筹款项不足一万元，十分着急，便写信约邓泽如前来，共商办法。12月18日，邓泽如来到新加坡，25日，在晚晴园召开筹款会议，一百余人到会，会议由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副会长陆秋露主持。胡汉民首先致词，说：“此次孙先生决定大举计划，实汉族存亡所关，现内地同志均竭力筹备，待机而动，尤望海外同志竭力资助、以底於成。”邓泽如报告他游历十几个城市，革命同志踊跃捐款的情况，会场情绪十分热烈，当地巨商沈联芳当场捐出一千元，其他人也量力而行，捐出了三千元。

12月31日，黄兴从仰光来到新加坡，见到胡汉民，知他只筹得一万余元，与计划相差太远，十分着急。当他得知邓泽如已去马六甲，便急急赶到马六甲，不料邓已回坝罗，黄兴又追到坝罗，见到邓后方知时至如今才筹得一万余元，他痛切地向邓泽如表示：如果在英属各埠不能筹足五万元，则广州再举的全部计划将会瓦解，这样的话，我也不必回香港了，只有去实行个人暗杀了。说罢，泪如雨下。邓泽如安慰他，说：我一个多月以来，走遍了十几个地方，同各方人士接触，大家都十分热心。目前只是一时没能达到我们所要求的数字罢了，不要着急。他劝黄兴亲自到各地走一走。

黄兴同朱赤霓等即刻前往芙蓉，住在矿务会馆。1911年元旦，黄兴约集当地革命党人和华侨三十余人，在安泰店开会。黄兴首先向大家说明：起义时间已经迫近，急需大量经费，假若英属各州不能筹足五万元，起义的准备工作便不能进行。与会者听后，纷纷表示愿尽力而为。谭德林当场捐出五百元。这时，恰好邓泽如赶到，他在会上历数筹款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谭德林听后，又拿出一千元；同时，宣布再捐出价值五千元的货物。

第二天，黄兴同邓泽如来到吉隆坡，会见商人陆秋杰，陆捐二百元，其他商人大都借故推托。次日，他们来到怡保，这里是华侨集中的地方，革命党人也不少。这一天，郑螺生在决醒圆宴请李源水、李孝章等热心赞助革命的人士，黄兴在会上陈述筹款中的种种困难，在有的地方，几乎是挨门挨户地劝说，但至今所得却同所需还相差很远。他沉痛地说：我同赵声等人，舍弃生命，在所不惜，但为大局计，不能不尽力筹足款项，以作起义的物质保证。若是冒险行事，则苦了人民，与心不忍。他殷切期望各位能够鼎力相助。在坐的诸位，在过去的几次起义中，都曾经慷慨捐资，这时听了黄兴的一席话，又深受感动。郑螺生、李源水、李贵子、黄怡益各自认捐一千元，黄怡益的妻子何氏也认捐五百元。郑螺生当场表示，愿将他在福建、江苏的铁路股票变卖，所得款项捐助革命。一席之间筹得如此多的款项，黄兴、邓泽如甚感欣慰。郑螺生、李源水等人向黄兴表示，英属各埠，一定要筹足五万元，已经募捐得到的款，保证年内汇到香港，决不延期。

1月9日，黄兴一路风尘来到新加坡，准备返回香港。第二天，他写信给邓泽如，对他热心奔走筹款，表示感谢，并要求他将各处寄来的款项，务于年内汇到香港。

槟榔屿会议前夕，孙中山就曾写信给友人咸马里，委托他在美洲筹款。会议结束后，孙中山暂留槟榔屿，11月中旬，召集当地革命同志及爱国华侨开会，共同商议筹款一事。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号召“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共肩救国之责任。”并表示：“吾党无论如何险阻，破釜沉舟，成败利钝，实在此一举。”语气决绝，感人肺腑。与会者当场认捐了八千元。

南洋英国殖民当局以“恐于地方治安有碍”为理由，命令孙中山离开此地。孙中山于1910年12月6日经科伦坡前往美洲。临行前，他写信给邓泽如、李蓼生，再次申述筹款对于革命成败的重要。

12月19日，孙中山到达纽约。此后，他奔走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在革命党和华侨中间宣传革命，动员捐款，没有一日休息。截至1911年3月，他已募集了所需款项的一半。

孙中山来美洲前，这里已经由陈耀垣、冯自由、黄芸苏负责运动筹款，进行比较顺利。待到孙中山来后，经他多方鼓吹，捐款者更加踊跃。以加拿大维多利亚华侨为例。美洲华侨多有洪门致公堂组织，他们都热心赞助革命。维多利亚致公堂是加拿大各城市致公堂的总堂，自己置有公产。2月22日，孙中山从温哥华到达维多利亚，24日，维多利亚致公堂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欢迎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在会上慷慨陈词，说明革命时机紧迫，急需大笔款项，希望大家踊跃捐款。大会当即通过一项决议，将该堂堂所连同地皮一并抵押给银行，把一万二千元押金全部捐献出来，作为广州起义经费。加拿大各地的革命人士和爱国华侨在这次募捐运动中，共捐款七万余元，居各地华侨捐款之首。

经过几个月的多方奔走，单凭他们的一张嘴，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历经艰辛，终于募得了十五万七千二百十三元。

#### 四、设统筹部

檳榔嶼会议决定设立统筹部，作为发动和领导起义的总机关。

会议一结束，赵声便立即返回香港，南洋筹款稍有头绪后，黄兴也于1911年1月18日回到香港。他们受孙中山委托，主持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1月26日，革命统筹部在香港成立。黄兴任部长，赵声任副部长。

统筹部下设八个课，由同盟会的骨干分别担任各课课长。一，调度课，负责运动新、旧军队。由姚雨平任课长；二，交通课，负责联络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西、福建、云南各路，由赵声兼任课长；三，储备课，负责购运军械，由胡毅生任课长；四，编制课，负责拟定规划，由陈炯明任课长；五，秘书课，负责一切文件，由胡汉民任课长；六，出纳课，负责出纳财政，由李海云任课长；七，调查课，负责侦察敌情，由罗焯扬任课长；八，总务课，负责其他杂务，由洪承点任课长。其余各同志，则分派在各个课任职。

统筹部总机关设在香港跑马地鹅井三十五号，另外，在跑马地九十五号、湾仔六十八号、六十七号三个地方设有分机关，协助总部工作。在中环路摆花街设立实行部，派喻培伦（云纪）、李应生等多人为实行员，专门在这里制造炸弹。实行部由温少雄单独负责。4月初，该部由香港迁到广州甘家巷，继续工作。

统筹部领导人鉴于以前一个机关被破获，往往牵连全局，所以这次设立机关，便规定各课由各自的课长负责，各课之间，不相互联系，所做事情，不相问，也不相告。

统筹部成立后，负责发动新旧军队和联络各方军事力量的调度课和交通课，积极进行工作，各方联络，为起义准备力量。调度课成立后，首先在广州新军中开展工作，了解军中同盟会员的情况，给他们分配新的任务，同时发展新同盟会员，壮大革命力量。通过同盟会员在士兵中作革命的宣传和发动工作，同时，还派人在巡防营、警察和民军中进行联络，发动他们中的倾向革命的分子在起义时作为配合力量。

黄兴还十分重视广州以外地区的联络工作，为此，统筹部专门设立了交通课，负责这项工作。黄兴委托谭人凤联络湖北、湖南地区的革命力量。他又派人在上海设立专门机关，以便同江苏、浙江、安徽的革命党人联系。他还派人到桂林，同广西新军中的革命同志联系，到时候举兵响应广州起义。

统筹部成立后，黄兴、赵声约请在广州的邹鲁来香港，请他在广州主办一份报纸，作为这次起义的宣传阵地。邹鲁欣然同意。他此时担任广东省谘议局书记，同时在广州方言学堂任教。邹鲁回到广州后，便立即在谘议局内部筹集经费。报纸取名为《可报》，利用当时谘议局禁毒案许多人投“可”票的“可”字，这样使外人以为这份报纸是谘议局办的，可以以此作掩护。该报的主要宣传对象是军队中的官兵。对于军队，名为减价，实际是每天免费赠送，在军中的宣传效果很好。随着革命空气的高涨，《可报》的言论也日益激烈。广州当局很害怕，但因该报冒着谘议局的名义，还不敢立刻禁止。这年的4月，《可报》详细报道了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清官吏孚琦，同时发表多篇措词激烈的评论，广州当局忍无可忍，便勒令该报停刊。

1911年2至3月间，南洋、美洲的汇款陆续到达香港，统筹部便派遣男女革命同志到广州。在城内城外分头租赁房屋，以供各地来广州的同志居住、



接洽各路军队及贮存枪械之用。当时，租赁房屋必须有人担保，租房的人还必须携带家属。于是，统筹部便在海滂西街和育贤坊先后开设两个米店，为租房时作担保用；同时，运送大米，还可以将枪械藏在包内，以便于运送。革命党人租房时，凡有姐妹妻女的人，都可以作为家属携带，没有妻女的同志，则由女革命党人假装家属，以掩人耳目。当时女同志少，机关多，女同志只好往来几个住处。

## 五、购运枪械

在各项准备工作中，以武器的制造、购置和运送最为重要，也最为艰险。革命党人凭着他们的智慧和勇敢，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炸弹是起义时使用的主要武器。它杀伤力大，造价便宜，携带方便。统筹部为此特别设立了实行部，选派实行员，专门负责炸弹的试制工作。起义日期日益迫近，号称“炸弹大王”的喻培伦被派为实行员，由日本来到香港。喻培伦在日本千叶医学校读书，热爱化学，对研制炸药，制造炸弹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一次试验中，不幸受伤，致使一臂残废，但他并没有因此罢休，终于试制成功一种烈性炸药和一种威力很大的炸弹。

喻培伦到香港后，选择荒无人烟的九龙海滩为实验场地，夜以继日，辛苦操劳，反复实验，终于试制成功一种引爆的好方法。原来炸弹做好了，不容易点燃，使用很不方便，现在他把安全火柴放在炸弹的导火绳上，即安全又易爆。

1911年1月末，黄兴派李文甫、林直勉、喻培伦、但懋辛和熊克武去广州，勘察广州城内外的地形、主要交通路线和重要机关所在地。要求喻培伦着重勘察阻击清军、投掷炸弹的地点。黄兴要求他们一一绘出简图。要想画出准确的简图，必须深入清军内部，任务十分艰巨。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是四川人，他的部下四川人很多。喻培伦、但懋辛、熊克武都是四川人，他们便利用同乡关系，通过李的部下，探听了一些水师布防的情况。他们还打听到观音山炮台为满族士兵把守，满兵贪图利益，多在炮台上设茶座卖茶，还开设赌场。喻培伦等便三三两两来观音山游玩，到炮台上喝茶，借观音山居高临下的形势，观察广州城内外的地形及交通路线。他们还利用游览的机会，来到大炮前，若无其事地检查了几门大炮，发现还可以射击。喻培伦经过察看，发现广州的民房，房顶相通，可以作通道，居高临下，又十分隐蔽，是个很理想的投掷炸弹的地方。

枪支、子弹没法自己制造，只有从国外购置。这项工作困难更多，耗资巨大，运送危险，黄兴等人预先估计，以八百选锋来计算，则最少也要有枪械六百支。后来在日本购置六百二十八支，在安南西贡购置一百六十支，在香港购置三百支，共耗资五万余元。

在日本购置的枪械，共分五批运往香港。购置不容易，运送更困难，可说是历尽了千般风险。

第一批枪械是由黄兴的长子黄一欧护送到香港的。这批武器有手枪七十余支、子弹一万发，共装了四箱。黄一欧身穿和服，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冒充宫崎寅藏的长子，同住在宫崎家的一个日本人一道，乘坐一艘外国邮船，平安抵达香港。

第二批枪械由湖南留日学生周来苏护送去香港。香港是无税港口，来往旅客向来不受检查。一天，洪承点忽然看见由上海开来的金山号轮船到岸时受到检查，回来将此事报告了黄兴。黄兴立刻电告日本东京的同志，要他们沿途注意。第二批军火已经在接电报的前两天乘船出发了，负责购运军火的吴永珊（玉章）立即派人从陆路赶到长崎等候。来人见到周来苏后，转告他船到上海时不要进口，抵香港时有人来接，并嘱咐他路上要小心沉着，并多给了他几百块钱路上用。谁知周来苏胆小怕事，船一过门司，他便将所住舱房的门关紧，把窗子打开，把枪支和子弹全部丢入海中，付诸东流。这批武

器的损失，打乱了统筹部的预定计划。以后，同志们就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周丢海”。

第四批枪械由方声洞护送。在从东京到横滨的路途中，这批枪械遇到了麻烦。装枪支、子弹的箱子不大，但份量却异乎寻常的重，引起东京车站工作人员的怀疑，他们故意把箱子上的牌子挂错。方声洞到达横滨取行李时，车站工作人员发现箱子上的牌子不对，便要方声洞说明箱子装的是什么东西，验对无误时，才允许把箱子取走。方声洞非常机警，他说行李是朋友托他带的，这位朋友已经先期回国，箱子上的钥匙他已带走，无法把箱子打开；同时，方声洞立即电告东京吴永珊，请他来横滨想办法。吴永珊闻讯，立即同陈策赶到横滨。陈策同工作人员周旋，见工作人员稍有松动，便边说好话边将箱子提出了车站。方声洞一人携带箱子在此乘船，顺利地抵达香港。护送军火的留日学生，大部分留在香港，参加了广州起义。

大批枪械运到香港后，黄兴、胡汉民便召集大家开会，讨论怎样把这批武器能够安全地分批运到广州。黄兴说：我们买了一千支短枪，每支枪配子弹二百发，合计二十万发，不下三百箱，还有上千支长枪，体积更大。有什么办法将这批武器既秘密又迅速的运往广州？他要求各位同志献计献策。与会者想了许多巧妙的办法。会后，几个贩运头发的同志闻讯，便找到黄兴、胡汉民，说：香港理发店积存的乱头发，由我们贩运到广州和内地，既肮脏又不值钱，每次都放在船舱最脏的地方，检查的关员嫌脏怕臭，每次过关，他们都挥手放行。把枪械装在头发包内，很容易过关。胡汉民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对他们加以鼓励。以后，便由胡毅生委派陈镜波在香港的鹅鸕桥开设一个头发公司，在广州的莲塘和小北仁里设立两个头发店，通过头发包，由少渐多，连续运送了几批武器，都无一失。另一部分子弹，密封在颜料桶里，报关寄到广州。

从西贡买来的枪械，由周之贞、郭汉图及女同志广妹藏在铁床，梳装台及盆花内，陆续运到江西的九江、存放在革命党人开设的医院内，然后由医院设法转运到广州。

革命党人杨光汉，单枪匹马。第一次，他化装成商人，乘船运来6支手枪，存放在广州西关丽真映相店（照相馆）。第二次，他用从新加坡带来的护照，乘金山号轮船，携带大批武器来广州。船到岸时，海关检查员查验他的护照，发现护照已很陈旧，摺痕很深，检查员拿在手上检查时，被折断了，便告诉杨光汉，这个护照因日久已无效。杨很着急，大声吵闹，佯装要殴打检查员。这时，恰好一个外国海关人员经过这里，杨便向这个外国人说检查员撕毁了他的护照。外国官员没加细问，便将杨光汉放行。杨冒险闯关成功。上岸后，他把藏有武器的行李存在中西旅店，当晚转运到丽真映相店。以后，杨光汉在粤秀街军械局附近租一栋房屋，佯装办婚事，让他的嫂子充当新婚，周之贞、郭汉图、胡宗媛等同志前来“贺喜”。趁这个机会把藏在丽真映相馆的武器装在新婚家俱中运到这里。

发难的前几天，各地购置的枪械，大部份都已巧妙地运到广州。仅储藏武器的机关就有38处。这时，各处参加起义的人员也已大部份来广州集中。怎么样把储藏在各处的武器运到发难的地方，又是一个大难题。这时，广州风声已经很紧，巡警在街头巷尾日夜盘查。男女革命党人在戒备森严的广州城内外，运送分发武器，个个争先恐后，来往奔忙，置生死于度外。

装在颜料里的子弹已陆续寄到，取出后存放在河南岸溪峡徐公馆。这里

是女同志徐宗汉的住处，对外称徐公馆。徐宗汉、王鹤鸣、李应生、莊六如等人连夜把铁桶一一起封。他们怕夜深人静惊动四邻，便弹琴唱戏来掩护。第二天，徐公馆门前贴出大红“喜”字，大办“婚事”，一批又一批的来宾贺客便把存在这里的武器运到大石街或凭黄兴手书的便条领走。

还有一部份武器藏在革命党人罗錚的家里。罗錚的小女儿阿炼同罗的四妹两人伪装向亲戚送礼，从容不迫地送往各处。罗錚则或化装成工人，或化装成伙夫，将武器分送出去。有的人则用假的茶壶和假的称锤，里面装上炸药，大大方方提在手上，运往各处。

## 六、定日发难

黄兴、赵声等人对发难前的准备工作，考虑得比较周到，做的也比较扎实。这是同以前任何一次起义所不同的。1911年4月初，各项准备工作已接近就绪。香港统筹部两层楼房的办事处，人来人往，进进出出，有前来参加起义的“选锋”，有运送枪械弹药的人员，也有前来送捐款的，统筹部的工作人员忙个不停。

黄兴、赵声认为发难的时机已经迫近，便于4月8日在香港召开发难会议，布置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会议由黄兴主持，他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说：“据我看，对方的力量比较薄弱。张鸣岐的卫队总数至多不过二百人，李准的卫队也不会比张鸣岐的多，城内的八旗兵力量也不大。我们若能购买一千支短枪的话，那么，我们的武装力量就可以大于敌人了。”

会议决定组织十路队伍发动攻击，并确定了各路队伍的负责人及攻击目标：黄兴率领南洋归国华侨及福建籍的同志一百人，进攻总督署，杀总督张鸣岐；赵声率领江苏，安徽籍的同志一百人，进攻水师行台，杀水师提督李准；徐维扬、莫纪彬率领广东北江同志一百人，进攻警察督练公所；陈炯明、胡毅生率领广州四郊的民军及东江同志百余人，堵截满人及占领归德、大北两座城楼；黄侠毅、梁起率领东莞同志一百人，进攻警察署、广中协署，兼守大南门；姚雨平率领他的部下百余人占飞来庙军械局，进攻小北门，接应新军入城，等等。会议确定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总司令。会议最后决定4月13日发动起义。

会后不久，便发生了两件原先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一件是美洲的大宗汇款迟迟不能到齐，南洋的一万五千元也没有如期寄到。第二件事是南洋革命党人温生才突然来广州，于4月8日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清朝广州官吏从此戒备更加森严。统筹部考虑了以上情况，决定将原定的起义日期推迟。

4月中旬以来，外省及海外参加起义的“选锋”陆续来到香港集中。黄兴、赵声考虑滞留香港的人越来越多，临到发动起义时一同前往广州，恐怕不好照料，便决定分期分批秘密前往广州。身为起义军总司令的赵声，打算同其部下一起去广州。因他在广州的熟人很多，不便于过早露面，同志们劝他缓几日再去。他便委托宋玉琳到广州，在城内马鞍街设立机关，代表他处理一切事务。

统筹部汲取上一年广州新军起义时临时无人在现场指挥的教训，决定由副司令黄兴先期去广州坐镇。黄兴于4月23日晚乘船来广州，住越华街小东营五号主持一切。是日凌晨，黄兴写信给南洋邓泽如，表示誓死的决心。信中说：

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所有此次出入款项清册，虽细数已有登记，当先寄呈公埠宣布，次荷属，次南北美洲各埠，无论成败，俾共晓然此次之数，涓滴归公。弟等不材，预备或有不周，用途即因之不当，负咎殊深。所冀汉族有幸，一举获捷；否虽寸磔（音哲，分裂牲体）吾躯，亦不足以蔽罪。惟此心“公”“明”（此明字作光明释，非明察也，兴注），足以对诸公耳。绝笔于此，不胜系恋。

此信的落款处铃有“铲除世界一切障碍之使者”和“灭此朝食”两颗印章，以铭其志。

黄兴到广州后，便在他的住处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并将起义

日期定为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他考虑到各路“选锋”已齐集广州，人多事杂，机关的秘密难以保守，而且经费开支也难以为继，况且有新军二标可能在下月初退伍的传言，所以，起义不能过早，但也不能太晚，因此，决定4月27日发难。

黄兴的到来，使各起义机关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同志们都明白，起义的日子不会太久了。革命党人群情激奋，行动也更加缜密，对革命胜利都抱着热切的期望。但是，恰在这时，外界的环境却突然出人意料地恶化了。

革命党人要在广州起义的风声早已为外人所知。因为南洋革命党人大张旗鼓地筹款，显然是为再次起义之用。虽然何时在何地起义至今密而未宣，许多人已经推测到可能是在广州。再加上香港方面再三催款，更加令人感到时间紧迫。清政府在南洋的耳目很多，自然会有情报送回来。近来，各路“选锋”到达香港后，三三两两，很惹人注意。因此，清政府便命令广东官吏严加防备。

更使人意想不到的是，开设头发公司运送武器的陈镜波，竟是清政府的侦探，胡毅生对他非常信任，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可疑的迹象，以致由头发公司运送的一百余支枪械，陈都如数报告了李准。李准获悉后，故意不动声色，不去搜查，听任革命党人自由往来，取送军械，绝不盘问，只是在司后街、小东营、莲塘街一带暗中严密布防。有一次，喻培伦搬炸药进屋，李应生的弟弟就听外面的警察说：“这想必又是那东西（指军火）。”李准的计划是张开罗网，任其投入，然后一网打尽。

4月23日，从新军驻地传来消息：清政府下令将新军的枪机全部缴去。军中本来就有枪少弹，如今连枪机也没有了，枪子就如同废铁。同时，有人报告，天字码头等处，不断驶来的长头蓝布篷船中，装载着陆续调来的清军士兵。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坏。23日，高第街瓷器店机关被搜查，同志饶辅廷被捕牺牲。当晚，黄兴又得悉，总督张鸣岐将在督署召开会议，准备在全城查户口。很明显，起义的日期已经泄露，敌人的戒备愈来愈严。

起义领导机关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起义的准备工作都如箭在弦上，难以住手。而敌人已经张开大网，正等待着革命党人的投入。原定的计划一下子都被打乱了。在这紧急关头，黄兴即日便召开紧急会议，将革命机密已经泄露，敌人已有准备的情况向到会的同志作了报告。他认为：现在武器已经全部运到，留学日本和各省的同志也都集中广州，在此紧急关头，应该采取迅速发难，先法制人的办法才是上策。陈炯明则主张缓期发难。一位留日学生反驳他说：“你们是本地人，地方熟悉，随处可以隐蔽，我们外地人，初到广州，人地生疏，言语不通，无地藏身，你们不干，我们就每人带两颗炸弹去炸张鸣岐，与他同归于尽！”

坐镇指挥、身负重任的黄兴听了各人的意见，十分为难，犹豫不定。当晚致电香港胡汉民，电文为：“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暗示在香港集合待命的革命党人，立即停止前来广州。港中的同志接电后，相顾失色，议论纷纷。

广州的局势继续恶化。黄兴被迫决定改期起义，下令除负责干部外，其余的三百多同志全部撤往香港、九龙，以免遭受搜捕。城内的几十个机关也陆续收缩。撤退的命令虽已下达，可黄兴的内心是非常矛盾和痛苦的。为了准备这次起义，集中了全部的精英，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将大批武器运往城内。所谓改期，无疑是解散。他眼看着一切的努力将付诸东流，真是痛心

疾首。

大部分人员遣散后，林文和喻培伦来到黄兴处，力陈起义不但不能改期，而且必须立刻发动。他们表示，非大干一场不可，生死成败，在所不计。留下的其他同志也都抱着必死的决心，赞成孤注一掷。此时，黄兴又获悉李准将调巡防营三营进城，该营中革命同志占十之八九。黄兴估计，这个营若能反正，就不愁其他清军不降；既有新军从城外接应，又有巡防营中的同志相助，于是他便毅然决定起义仍按原计划进行。这一天是4月26日，距起义日还有一日。他立刻致电香港：“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暗示香港的同志立刻全部返回广州。

## 七、仓促备战

黄兴要求香港党人速来的电报，26日晚才到达。赵声、胡汉民惶惶不知所措。起义日期的一再变更，已经打乱了香港方面的部署。这时香港有三百多人和二百多支枪，发难日迫在眉睫，由香港开往广州的最后一班夜轮已经启航，大家心急如焚。讨论决定，一部分人乘27日早班轮船去广州，因大部分人没有发辫，若全部乘早轮，会被发现，难以上岸，最好大部分人乘晚班轮。这样的话，起义日期必须推迟一日。他们立即致电黄兴，要求延缓一日。

要求延期，对黄兴来说，已经为时过晚了。受命前往说服黄兴的谭人凤26日中午到广州，来到黄兴处，只见黄兴正一面电告香港，一面进行起义的部署，分发子弹，整装待发。将原来十路进攻的计划根据具体情况改为四路：第一路由黄兴率领，攻两广总督署，第二路由姚雨平率领，攻小北门，迎接起义新军和巡防营入城，第三路由陈炯明率领，攻巡警教练所，第四路由胡毅生率领，守大南。

各路人员约定，27日下午五时三十分一齐行动。

4月27日这一天，起义总指挥部的小东营五号，门前装伴的像办喜事一样。上午，广东、广西、湖南、四川籍的同志及华侨打伴成贺禧的客人，陆续来到这里集合。有人在屋里擦武器，有人在喝酒，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大部份人员到齐后，便进行编队，而后黄兴作了战前动员，要求“各队一定要互相掩护前进，听从号令冲锋。”大家磨拳擦掌，争当先锋。这时，朱执信风风火火来到指挥部，见大家整装待发，非常着急，要求参加战斗。他不顾同志们的劝阻，要来一把剪刀，把身上穿的长衫剪去半截，加入了队伍。谭人凤见劝阻已经不可能，便向黄兴要枪。黄兴见这样一位年过半百、两鬓染霜的老者也要投入战斗，非常感动。稍后，他又心平气和地对谭说：“先生年老，后事尚须人办，这是决死队，请不要去。”谭愤然反驳说：“你们都敢死，我独怕死吗？”黄兴见他坚决，便给了他两支手枪，谭接过后枪，不小心触动了枪机，砰然一声响。黄兴惊慌之后，将枪从谭手中要了回来，连声说：“先生不行！先生不行！”

喻培伦为了制造炸弹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这天下午，他匆匆来到莲塘街吴公馆，要求参加战争。大家劝他留下来，有人说：你一条手臂已经残废，不便作战。他反驳说：“诸公四肢完整，不一定比得了我这残废人！”

队伍出发前，每人发给一元钱和一个大饼，配给了枪支或炸弹。每个人都脚穿黑面橡胶鞋，规定以白毛巾缠臂为统一标志，吹螺号为统一信号。

同一天，敌人也在紧急部署。这天上午，设在谢恩里的革命机关被敌人侦破，因此，总督张鸣岐立即发出三道紧急命令：一，预备开战；二，城外如有火警，不准开门赴救；三，大搜党人。

一场决战就要开始了！



## 八、孤军奋战

“时间已到，各队出发！”黄兴一声令下，一百三十余名革命党决死队员，浩浩荡荡从小东营出发，林文、何克夫、刘梅卿等四人为先导，他们手拿海螺，一时呜呜声动，风起云涌，直扑向前，很快来到总督署门前。

出发前，为了便于进入督署，黄兴决定由四个精通日语的人乘轿，冒充日本人来谒见总督，并同做内应的督署辕门门卫约定，他们下轿后举白旗为信号。这天黄兴、朱执信等乘轿来到督署门前时，不料卫兵反悔，开枪射击，革命党人开枪还击。战斗开始。

督署东西辕门各有一连门卫把守，这时卫兵正在吃晚饭。林文率先冲在前面，抛出一颗炸弹，炸死几个卫兵。突然来的袭击使管带金振邦和卫兵措手不及，纷纷丢下饭碗，躲进屋内。革命党人见卫兵逃散，便向他们高喊：“我们是革命军，为中国人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若赞成，请举手。”卫兵不听，革命党人又抛出一颗手榴弹，随后，枪杀了金振邦。黄兴乘机率领十几个人由侧门攻入督署，其余大队人马蜂拥而入，来到二堂。这时，一个姓张的巡捕闻声急忙把大堂和二堂之间的宅门关闭。众人将门撞开，黄兴率领大家来到大堂。几个卫兵见革命党人冲了进来，便向他们招手，并示意张鸣岐就在花厅。黄兴、何克夫、朱执信等便径直奔向花厅。不料卫队凭着木栏杆，躲在柱子后面开枪阻击，杜凤书、黄鹤鸣牺牲，朱执信被后面跟上来的人自己人误伤。黄兴躲在一根大柱的后面还击，打伤卫兵一人。其余卫兵被革命党人堵在屋内，纷纷弃枪投降。黄兴、林文、朱执信等人直入花厅，但却空无一人。只见衣架上挂着几件大衣，桌子上摆着几只碗，水烟筒还有热气。他们断定，张鸣岐等一定是刚刚离去。

原来这天下午，张鸣岐等人正在这里商议如何防范革命党。正议论间，那个姓张的巡捕关上宅门后急忙前来报告。张听说革命党人已经攻入督署，惶惶然不知所措。还是这个巡捕，几经周折，把他转送到水师行台李准处。黄兴等在花厅四处寻不到总督，却发现一个老者和两个女人，躲在房子的一角发抖，经讯问，方知是张鸣岐的老父和妻妾。黄兴遂对他们说：“不干你们的事，不要害怕！”

黄兴打算在督署放火，作为起义的信号。但是，到处寻找点火的材料，找不到，便将火种放在床架上，然后离去。黄兴率队伍向左冲出东辕门，恰巧遇上候补道台李象宸乘四人轿由东往西而来，他们闻听轿夫连声吆喝“李大人到！”误以为是李准，便举枪射击，李象宸当即毙命。

当黄兴率队攻入督署后，李准已闻讯派兵前来支援，待到黄兴等撤出时，支援的敌军已经将机枪架在了东西两边的辕门上。林文过去曾听赵声说过，李准的部下有革命党人，他便跑到前边，高声喊到：“我们都是汉人，应当同心协力，共同铲除异族，恢复汉疆，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话音未落，一颗子弹打来，林文头部中弹，当即阵亡。黄兴右手被打伤，断了两个指头，他不顾伤痛，指挥撤退。刘元栋、林尹民、陈燊等二十余位革命同志先后阵亡。当时，刘元栋尚有一点气息，同志们想扶起他离开阵地，他挥挥手，声音微弱地说：“你们前进，不要顾着我啦！”

撤出督署后，黄兴重整队伍，准备再战。他将有限的人员分为三路：一路由徐维扬率领，出小北门，与新军接应；一路以四川、福建、南洋的党人为主，前往攻击督练公所；一路由黄兴亲自率领方声洞、朱执信、罗仲霍、

何克夫、李子奎、郑坤等 10 人出大南门，与巡防营接应。匆匆部署后，各路立即分头行动。

黄兴一路往南，准备出大南门，途经双门底时，同由南往北开来的几百人的巡防营队伍相遇。巡防营的哨官温带雄及哨长都是革命党人。他们见迎面而来的 10 人臂缠白巾，知道是自己人，便喊兄弟！走在前面的方声洞，见对方没有白巾标记，又枪口向着他们，便断定是前来支援的敌人，举枪便向来人射击，当即打死了走在前面的温带雄，对方开枪还击，方声洞也中弹牺牲。由于误会，双方发生了激战。顿时，硝烟弥漫，弹如雨下。战乱中，黄兴摘下一个商店的铜牌作掩护，边战边退，其余的人也随黄兴南下。当来到卫边街时，队伍已被冲散。黄兴回头四望，见身边已无一人，他只身来到一个洋货店门前，见店门紧闭，紧急中以肩猛撞，将店门撞开，闪身躲进店内，回身从门缝中发出两枪，左右射击，将追兵击退。

徐维扬率领的一路撤出督署后，很快同敌人接上了火，徐维扬一面迎击敌人，一面派徐满凌到洛城街，企图堵截观音山方向的敌人。徐满凌等人在德宣街口同敌人相遇，展开巷战。敌人居高临下，革命党人难以仰攻，便转战到大石街，攀登上屋顶，向观音山敌人射击，企图占领观音山阵地，久攻不克，只好撤退。徐满凌等人初到广州，道路不熟悉，路灯又忽然熄灭，眼前一片黑暗，恰巧遇到一个更夫，便请求他带路，将他们带出小北门，谁料这个更夫不往北带，却将他们向南边引导，来到仓边街，同巡防营相遇，只好且战且退，恰在此时，遇到李德山率领的一队人马迎面过来，便一同往小北门撤退，行到高阳里，又遇到大队敌兵，他们便躲进盛源米店，搬出几个米包作掩体，同敌人展开殊死战。后因米店门前起火，只好撤出。李德山、徐满凌被捕，大部份人战死。

徐维扬一路来到司后街应敌，奋勇作战。手枪、炸弹齐发，敌人招架不住，退回保卫水师行台。徐维扬等来到小东营指挥部，将敌人击败。随后同援军合力突围。五人被俘，徐维扬突围出来，遇到李文甫等人，便又联合去攻飞来庙、企图夺取武器库，力战不克，李文甫被俘，徐维扬来到城西。

正当各路革命党同清军奋勇巷战时，仙湖街始平书院炸弹轰鸣，军警闻声迅速将其包围。这里原是革命党储存军火的机关，驻守机关的陈潮看到清军从此经过，便从里面投掷炸弹，炸伤几个清军，他也以身殉职。

至此，从小东营出发，由黄兴率领的一百三十余人的队伍，进攻督署，转战街巷，英勇奋战，大部分人阵亡，一部分人被俘，少部分人走散脱险。

我们再看看另外一路，集中在莲塘街吴公馆的三十余名革命党人战斗的经过。

27 日下午 5 时许，喻培伦、但懋辛、熊克武等人正在作战前准备，忽然听到总督署方向响起了枪声，大家立刻出发，情绪激昂，有人一手拿枪，一手拿大刀；有人两只衣袋装满炸弹，有人把一筐炸弹索性挂在脖子上，跑步向督署方向前进。队伍来到督署后门，喻培伦一跃向前，一连投去两颗炸弹，只听轰隆一声响，后墙被炸开了个大洞。懋辛先冲了进去，当即右臂中了一枪，顿时鲜血直流。他不顾伤痛，同大家一涌而入。一时间枪声、炸弹声齐鸣，守卫的清兵四散逃命。这支三十余人的队伍从督署后门直冲到前门。此时，黄兴率领的大队人马已经撤出。他们便同还没有撤走的几十名广东的同志合为一队，从督署直奔督练公所。

这支队伍来到莲塘街北口时，正好遇到李准派来增援的水师，双方展开

了激战。他们分散隐蔽在街道两旁的店铺中，利用走廊的墙壁作掩体，阻击敌人。只见喻培伦身上背着一大捆炸弹，额头上沾满了灰土，威武勇猛，一人当先，抛掷炸弹，所向披靡，敌人为之丧胆。他身上多处受伤，但却不顾伤痛，只身爬上房檐，伏在房顶上，等待清军冲过来时，居高临下，猛投炸弹，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终因众寡悬殊，难再坚持，且战且退。他们原来约定用小喇叭作为联络暗号，此时因为怕被敌人发现，不能利用。在黑夜中大家失去了联络，最后只剩下但懋辛、熊克武、莫纪彬、饶国梁等 7 人在一起，其他人则走散或阵亡。

但懋辛等 7 人来到城边时，见城门已关闭便决定翻越城墙出城。7 人来到城墙下的芦苇丛中，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不觉又走散了。饶国梁误入敌营被俘，最后只剩下但懋辛和熊克武在一起。他们发现城墙上敌兵防守，不时还放冷枪，很难翻越。他们二人都是四川人，道路不熟、语言不通，只好躲在一个公共厕所里等待天明。天将亮时，熊克武出去探听情况，被清军阻隔，便到河南的一个朋友家中避难。但懋辛在厕所里躲了两天，饥饿难忍，便冒险到水师行台投案。李准闻讯，很赞赏他的勇敢，便给他治伤，发给路费，让他回家。

27 日晚，赵声同胡汉民率领在香港的二百余革命党人乘夜轮于 28 日晨到达广州，上岸后方知昨晚已经发难，现已败散。此时四方城门紧闭，不得已便又分头返回香港。赵声迷了路，来到河南，遇到女同志庄六如，庄把他带到黄兴住处，二人相见，抱头痛哭。

起义前夕，黄兴将十路军改为四路军，约定 27 日下午 5 点 30 分同时举动，不料，胡毅生、陈炯明、姚雨平三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动，贻误了战机；新军、巡防营也没能及时地参加战斗；原先联络的民军，大多数也因起义日期一再变更，先后被遣散。所以，广州“三·二九”起义，实际上只是一百多名革命志士，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在城内左冲右突，澈夜巷战。一些人饮弹牺牲。一些人被俘，幸存者寥寥无几。

## 九、黄兴脱险

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当晚，清两广总督张鸣岐便下令关闭各方城门，派兵把守各个重要街口，禁止一切行人往来。他还传令，无论什么人，凡是能杀革命党的，即以杀的多少来计算，每一颗人头赏一百零二元。尽管如此，广州市民仍有许多人同情和支持革命党人的正义行动，他们冒着全家被株连的危险，将革命党人藏在家中，或为他们引路，有的送给他们衣服。正是在人民群众的保护下，一些革命党人在森严恐怖的境况下能够脱离险境。

黄兴自从在双门底一战走散后，躲在一个洋货店内，击散了追击的敌兵。他感到口渴，想找口茶水喝，找遍了店中没见有人。稍稍休息后，方才感到受伤的手指疼痛难忍，他便找来凉水进行冲洗手上的积血，血水横流。然后，从自己的袜子上撕下一块将伤口包扎起来。正在这时，该店的伙计郭季文从外边回来，推门不开。黄兴闻声急忙用身体紧紧顶住门板，对门外的人说：没什么事，上边打架，我被人打伤，现正急着从长堤出去，不知外边的情况怎么样？郭恰巧从长堤过来，便说，城门已经打开。黄兴听后将店门打开，郭进来后，见他那副模样，心中便明白了一切。他找来一件黑色的长衫，让黄兴穿上，换下他的血衣，又给他找来一顶小草帽。黄兴道谢后准备出城。他一想，自己道路不熟悉，语言又不通，很容易被敌识破，便央求郭季文给他带一段路。郭把他送到五仙门直街。这时恰巧岸边停着一艘小艇，黄兴叫来船主，要到河对岸的海幢寺，打算从那里到溪峡机关。船主索取高价，他如数交付了船费，谁知船开到河南东边，便催他上岸。

登岸后，黄兴一打听，方知此处距溪峡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他步行到漱珠桥杂货店，打听到溪峡怎么走，可是，语言不通，没办法，便大着胆子去问警察。黄兴站在桥头，观看河北岸的满城火光，伫立很久，思绪万千。在此不敢过久停留，便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继续前行。

他不知道溪峡机关的门牌号码，只知是胡宅，刚刚办完喜事。黑夜中来到一家门前，看到两旁贴着一副大红对联，猜想可能就是胡宅，便上前敲门。家中只有一个女仆，不知来人是谁，便不许他进。黄兴再三央求，才允许他进来。进来一看，果然是溪峡机关。这时已经是晚上九时，家中的同志全部外出活动，只留女仆看家。黄兴上楼想找地方稍事休息，只见一个人直挺挺的站在那里，以为是被人勒死了，忙上前去看，原来是一个小婢在那里打瞌睡，黄兴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他坐下等待来人。不久，女同志徐宗汉从外边回来，见黄兴这副模样，大吃一惊。见他右手指还在流血，便赶忙替他重新包扎，然后安排他休息。

第二天清晨，女同志庄六如出去给黄兴买止血药，恰巧碰到迷路走来的赵声。庄急忙把他带到机关。赵声看到黄兴，两人抱头痛哭。黄兴因连日操劳，右手受伤失血过多，经不住过分悲痛，便晕倒在地，众人慌忙抢救。身边没有药，只好给他灌葡萄酒，方苏醒过来。赵声向黄兴述说了4月27日晚来广州及次日晨上岸后的经过。黄兴按捺不住满腔悲愤，起身下地，要过河去同李准和清军拼命。赵声、徐宗汉及在场的同志极力劝阻，方才罢休。为了避免敌人继续搜查，凡是党员同志来询问黄兴下落，都告诉他们已经战死。对外也宣称黄兴已死。

清军继续搜查，这里不便久留。30日晚，庄六如乘夜轮护送赵声经澳门回香港。次日，黄兴身穿灰布长衫，由徐宗汉陪同，乘哈德安号轮船去香港。

这班轮船已经客满，有不少是脱险后去香港的党人。房间已经客满，黄兴只好坐在厅中的椅子上佯装睡觉，徐宗汉坐在他身边把他挡住，一路上没有人发现。

到达香港后，受伤的手指伤痛日益严重，有一个手指将断没断，只好到雅丽氏医院进行手术，徐宗汉以黄兴妻子的名义签字。从此，他俩便结为真正的夫妻。在医院治疗期间，清官吏侦知，便派人到香港交涉，要求香港政府将他逮捕，引渡到广州。香港政府下令前往医院捕人。警察局侦缉部书记黄琼芝是同盟会员。他接到这一命令后，一面故意拖延，同时通知各革命党机关。幸好黄兴已出院转到九龙。

赵声回到香港后，即惋惜起义失败，又痛悼战友的牺牲，抑郁悲伤，百感交集。他原来就患有肠病，因心情郁愤，以致病情加重。起初他坚决不去医院治疗，致使病情急速恶化。黄兴、胡汉民等再三催促，待到入院后，因延误时间过久，盲肠已经化脓，病情危急。身旁的同志见此情景痛哭失声，哭声惊醒赵声，他微微睁开眼，细声说：“吾负死难诸友矣。雪耻唯君等。”嘱其夫人好好侍奉老父，言罢，含恨而逝。这一天是5月18日。他年仅32岁。同志们把他安葬在香港茄菲公园。民国成立后移葬故里，追赠为上将军。

## 十、功败垂成

在中华民族濒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尽管当时革命的力量一时还很小，但他们却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再接再厉，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进行再次起义的准备和发动。他们倾注了全党的人力和物力，做了他们自认为能够做到的一切准备工作。当起义即将发动、局势发生了他们事先没有料到的骤然恶化时，尽管起义胜利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但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还是以必死的决心，同封建专制统治进行了一场殊死的决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唤醒人民大众，继续奋斗。起义发动后，一百多名决死队员在广州的大街小巷，同清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的过分悬殊而失败。

这次起义中阵亡和事后牺牲的烈士，共有 86 名。他们之中，以籍贯计，四川 3 名，安徽 3 名，江苏 3 名，福建 19 名，广西 7 名，广东 51 名；就年龄计，最小的 18 岁，最大的 52 岁，多数是热血青年；就职业计，工人 16 名，农民 14 名，学生 12 名，军人 10 名，教士 5 名，教员 3 名，报界 2 名，小公务员 1 名，商人 2 名，技击家 2 名，职业不明者 19 名。86 位烈士中，27 位是华侨；牺牲的 12 名学生中，8 人是留日学生。

他们为了拯救祖国，慷慨起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孙中山先生在从纽约赴芝加哥的旅途中，从报纸上获悉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4 月 28 日到芝加哥的当晚，便亲自草拟电报稿，发往香港，探询情况。在此后的一周内，他连发三封电报给胡汉民，均没收到回电。孙中山忧心忡忡。直至 5 月 4 日，孙中山才得到胡汉民的复电，得知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已经脱险，便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天下事尚可为也！”

起义失败后，胡汉民等领导人便立即商议如何处理善后。他们致电孙中山先生：“恤死救亡，善后费重，奈何？”孙中山立即在华侨中筹款，很快筹得三千美元，电汇香港。胡汉民拿到这笔款项后，即派人到广州，处理善后。对于负伤回家的同志，发给医药费；对于战死的，抚恤其家属；藏在市内各处的枪枝、弹药，设法妥为保存，并将原设机关迁移到别处。新军和巡防教练所因为没有参与起义，这里的革命同志没有暴露，设法保存这批革命力量。脱险来香港的同志，发给旅费，予以疏散。

赵声去逝后，黄兴同胡汉民联名致书华侨同志，报告广州起义的经过，总结这次起义的经验教训。全文七千余字，黄兴口述，胡汉民执笔。文章叙述了统筹部分课办事经过，破坏广州城的计划，经费预算及支出的情况，延缓起义日期的原因，选锋的召集，枪械的运送及接收，黄兴入广州及攻击督署的经过，巷战及党人的英勇，失败的原因及领导者的不得力，善后事宜，等等。

关于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孙中山先生认为，仍在款项筹备的不充足。他在 5 月 7 日致谢秋的信中说：“当时港电催款，内心焦急，却少有所得。”“及至多伦多·刺将军（指温生才刺广州将军孚琦——编者）之事始发矣；若此时有款，乘机而起，当可成事也。此事发现之后，始得多伦多变卖公堂之万元，然党军乃能陆续进城。然款犹未足，人犹未集，而彼敌之严防，三月二十九日事泄人拿，不得不动，故此失败。”他认为，在款项尚没筹足，人员尚没集中时，起义的计划已经泄露，机关被破获，人员被捕，不得已仓促起义，所以失败。

黄兴在同胡汉民致加拿大同志的信，关于起义失败的原因总结了两条。一，他们认为这次起义仍然同以往起义一样，“一面办事，一面筹款”，1910年冬即着手组织了统筹部，而南洋、美洲的大宗款项则三月中旬以后方陆续汇到，对外难免泄露风声，况且内部也“有极多障碍”；二，他们认为是“待械以应用，待款以购械，械未至而众已集。”也就是说，整个起义的准备过程处于被动的局面，因此难免考虑不周，更没有回旋的自由。

起义虽然失败，但烈士们的鲜血却没有白流。从此以后，革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孙中山在他5月7日致谢秋的信中预言：“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

黄花岗起义犹如一声春雷，震撼着大地，震醒了国民：“一时风声所播，全国震动。”一些过去不赞成革命的人，当得知林文、方声洞、喻培伦等人英勇牺牲，听说革命党人据米店为阵地，数十人抗击清军千余人，坚持两日之久，后又脱险而出的消息，大家都“奔走相告，眉飞色舞”。烈士们的英雄气概，激励着人们继续奋斗。

孙中山对这次起义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事虽失败，而其为影响于世界及海外华侨，实非常之大。由此所得效果亦不可胜量。”“弟敢决此次失败之因，必定生出他日成功之果也。”

消息传到武汉，武汉的革命党人摩拳擦掌，“愤求速进”。就在这次起义的下一个个月，即1911年的5月，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便着手进行联合，积极准备再次发动武装起义。不到半年，即在这年的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革命的熊熊烈火很快在中国大地燃起。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很快便处在土崩瓦解之中。1912年1月，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诞生。清宣统帝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宣布退位，从而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

在促进这段历史的巨大变革中，黄花岗起义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历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 十一、浩气长存

这次起义牺牲的 86 位烈士中，有 55 位战死，31 位被捕就义。他们都怀着为革命必死的决心，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刑场上，都表现了一个革命者“虽百死而不辞”的大无畏的精神，谱写了一页又一页光辉悲壮的篇章。烈士们所表现出来的浩然正气，将长存人间，永远激励人们前进。下面，仅介绍他们之中的几位烈士的英雄事迹和高尚情操。

林觉民。字意洞，福建闽县（今属福州市）人。在福建高等学堂读书时，开始接触西方的民主思想。性格刚直，敢于斗争。1906 年，他东渡日本留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1911 年春，林觉民同林文同船到香港，参加起义的筹备工作。黄兴见林觉民前来，高兴地说：“意洞来，天赞我也！运筹帷幄，何可一日无君！”起义的前几日，他奔走在香港和广州间。4 月 24 日晚，在香港，想到老父、爱妻，思绪万千，挥泪疾书，同家人诀别，天亮后交给一位朋友，托友人在他死后转交家人。

4 月 27 日晨，他同方声洞等福建籍的同志再来广州，下午随黄兴攻击总督衙署。在随队伍撤至东辕门时，同清兵激战中，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腰部，随即倒地。他忍痛跳起，同清兵拼杀，多处受伤，最后精疲力竭，被俘。

李准和张鸣岐亲自审讯。他在堂上侃侃而谈，综论世界的形势，在座的官员都倾耳细听，李、张也表示佩服。开始时他坐在地上，听了他的一席话后，便令人给他解去镣扣，让他坐在椅子上，给他纸、笔，让他写供词。他纵笔一挥，很快写满了两页。写完供词，又发表演说，慷慨激昂，说到国家面临危亡时，捶胸顿足，激动不已。他劝清官吏洗心革面，为国家献身，革除专制暴政，建立民主共和，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他死也可以瞑目了。在关押期间，他受尽酷刑，滴水不进。在刑场上面不改色，从容就义。年仅 25 岁。

林觉民牺牲后，家人收到他的两封诀笔书。在给妻子陈意映的信中写道：“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信是写在一块白绸手帕上的，一千余字，把对妻子的情爱同报国捐躯的激情熔为一炉，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永远激励人们前进。

方声洞。字子明，福建候官（今属福州市）人。1905 年入日本千叶医学校读书。不久，同妻王颖同居千叶。他虽有一个欢乐的小家庭，却没有一刻忘怀国事。他常对妻子说：我们的小家庭虽然很美满，但是有国才能有家，我们不起来救国，中国就有亡国的危险。他同哥哥、姐姐、嫂嫂、妻子先后加入同盟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举家加入革命党，在日本留学生中一时传为佳话。

1911 年春，东京革命党人大部分要去香港，留方声洞等少数人坚持工作。方极力争取去香港，说：“我愿为国捐躯久矣。今有死所，奈何阻我去！况事败，诸君尽死，我能独生吗？”在同志的再三劝说下方才留下。4 月中



旬，他奉命押送军火去香港，在革命气氛的感染下，决然留下，参加起义。4月27日下午，在进攻督署时，奋勇向前。在驶往督练公所途径双门底时，同响起义的巡防营发生误会，饮弹牺牲。时年26岁。

起义前夕，方声洞给父亲写信诀别，表示为国赴死的决心。信中写道：“逆者，与海内外诸同志共谋起义，以扑满政府，以救祖国，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

喻培伦。字云纪，四川内江人。1905年赴日本留学。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他同黄复生、汪精卫来到北京，在宣武门外设守真照像馆作掩护，准备刺杀摄政王载沣。刺杀行动没有成功，喻培伦逃亡日本，黄、汪两人被捕。

1911年春，他奉命从日本运送弹药到香港。在香港，被指派为实行部的实行员，负责制造炸弹。4月27日，他同四川籍的同志由莲塘街吴公馆出发，参加进攻总督署的战斗，后转攻龙王庙弹药库。他一人当先，抛掷炸弹，敌人人为之丧胆。终因弹尽力竭被俘。

敌人审讯时，他化名王光明，大义凛然，讲述他如何制造炸弹，并庄严宣称：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表现了革命党人为民主、共和奋斗的坚强信念。牺牲时年仅25岁。

1912年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追赠喻培伦为“大将军”。

林文。名时爽，福建侯官人。为人豪迈爽侠。革命党的同志们亲切地称他为“林大将军”。他于1905年留学日本，同年8月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福建分会会长，经常在南洋、香港奔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参加同盟会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

1911年春，病中得黄兴、赵声信，告诉他“事大有可为，请偕同志来。”林文见信，非常高兴，立即率领福建籍的同志数十人前往香港。在香港，他曾向同志们表示：“今日愿与诸君挟弹为前驱，”并表示待革命成功后，“则当茅结西湖之畔。”表现了他为革命誓死的决心和不计功名的高尚情操。4月23日林文到达广州，听说起义将改期发动，便代表福建籍的同志和四川党人喻培伦来到黄兴的办公处，陈述理由，极力主张起义不但不能改期，而且必须立刻发难，以先发制人。黄兴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4月27日下午5时半，林文全副武装，精神奋发。他左手拿着号筒，右手握着短枪，怀里揣着炸弹，腰间佩着短剑，威武雄壮，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同黄兴率领的一百多名决死队员由小东营出发，一路所向披靡。撤出督署时，同清兵相遇，喊声大震，弹如雨下，林文毫不畏惧，意气风发，冲锋突围，奋勇向前。在向清军喊话时，中弹倒地，脑浆喷出，壮烈牺牲，年仅25岁。

庞雄。字甦生，广东吴川人。家境贫寒，早年投新军。参加广州新军起义，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1911年来广州，这时，广州已经集中了一批革命党人，庞雄得知黄兴也在这里，便立即去找黄兴，要求参加起义。黄兴考虑各路决死队员多数都是外省人，不懂广东话，办事很不方便，便把他留下，充任翻译，同时管往来的文件。4月27日，黄兴率众人攻击总督署，庞雄属文职，本可以不参与军事行动。他看到队伍即将出发，急忙携枪跟随在队伍后面，直奔督署。退出督署后，他同战友们转战各街巷，一直到天亮。天亮后，他在街头看见到处横躺着同志的尸体，血流满地。他痛不欲生，正在流泪叹息时，一群清兵走过来，见他头上没有发辫，便将他捕去。

敌人审讯时，他神色坦然，承认自己是革命党，并详细叙述起义经过。他滔滔不绝，痛斥官场腐败。讲罢，仰面哈哈大笑。堂上审讯的官员听后都胆寒。敌人问他同党还有谁，他说还有徐锡麟、汪精卫，故意戏弄他们。又问他是否后悔？庞雄厉声回答：“我视死如归，立志已久，只恨一死未足以尽职。男儿死耳！那像你们首鼠两端！”声色具厉，问官不敢再问。临刑前，清吏看到他年轻貌美，为他叹息，庞雄听后，放声大笑，说：“我自行我天职以救同胞，谁无一死，何惜有之。”从容就义，时年 21 岁。

海外的爱国华侨，不但为支援起义捐助了大量经费，还有许多革命志士，回国参加起义，他们之中有的壮烈牺牲，有的从容就义，谱写了华侨史上英雄的篇章。

罗仲霍，名坚，字则军。早年在南洋各岛从事革命活动。4 月 27 日下午随黄兴攻击督署时，左脚受伤，误入旗人街被俘。敌人把他绑在柱子上，他坚贞不屈，实践了他“愿将铁血造世界”的遗愿；李晚，字晚军，1911 年春随黄兴到香港设立机关。起义的前一天，写信向哥哥诀别，表示“决以生命为牺牲，推倒满清，建设中华民国。”在攻击督署时力战牺牲；余栋雄，家为富商，15 岁加入同盟会。1910 年冬，得知国内革命正在筹备起义，便同好友郭继枚一同秘密到香港。起义时，受命同罗仲霍、何克夫轰炸督署。他奋勇直前，连抛三颗炸弹。后中弹牺牲，年仅 18 岁，是 86 位烈士中最年轻的一位。

## 十二、碧血黄花

在起义中英勇捐躯和被俘后从容就义的革命党人的遗骸，散落在各大街小巷，直到第四天，清朝官吏才通知慈善堂收殓尸体。各慈善堂接到通知后，才派人把各处的烈士遗骸收殓到东门外省谘议局门前的空地上，共七十二具，依次排列了十几堆。断头折臂、血肉模糊，行人从这里经过，都不忍目睹。

几十具遗骸，埋葬在哪里？引起了争议。南海、番禺两县的知县（当时广州分属两县管辖），打算埋葬在臭岗。一位外国传教士听说后，十分不安。他认为各位志士都是为了改革自己国家的政治而牺牲的，皓皓侠骨怎么能同罪犯埋葬在一起呢？他自愿捐出一块净地埋葬烈士。这事被慈善堂的董事徐树棠知道后，觉得埋葬烈士用外国人购买的土地，是国家的耻辱，便婉言谢绝了教士的好意。

革命党人潘达微，在准备起义时虽然参加了一些工作，却始终没有暴露身份。他在危难之际，毅然冒险挺身而出，以《平民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四处奔走，几经周折，终于说服了徐树棠。将他善堂的一块地段，位于沙河马路旁，毗邻三望岗，地名叫红花岗，青草白地，是一片净土。他还表示，官殓、营葬各事可统统由广仁善堂办理。潘达微随即到红花岗观看，他认为地势虽说不尽雄巍，但在仓促危难之中能得到这么一块净土，已经不容易了。他当即就同徐树棠定了下来。

潘达微星夜找到收殓尸体的工人，嘱咐他们收殓遗骸。5月3日，这一天广州城上空乌云密布，细雨霏霏。谘议局前的气氛更加显得阴冷。路上的行人很少，只有一百多名收殓尸体的工人，来往于红花岗到谘议局的路上，自上午11时至下午4时，历时5个小时，收殓才告完毕，潘达微跟随最后一具棺木，步行到红花岗。

潘达微安葬完烈士，本想隐而不宣，不料保皇党的《国事报》别有用心。首先披露了此事。潘见事情已经公诸于世，迫不得已，便在《平民日报》上以《谘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为题，宣布收殓七十二烈士的始末。他把红花岗改为黄花岗。因为他认为“红花”二字比较软弱，不如“黄花”一词雄浑优美，又含“秋菊傲霜”之意。从此，后人称广州“三·二九”起义为黄花岗起义，黄花岗便名垂青史。

不久，潘达微作了一幅画，刊登在《时事画报》上，画面题句是：行人风雨亭前立，指点黄花是血花。他还画了一幅黄花岗的画，刊登在《平民画报》上，图的画面是：累累荒冢，背后是一片朝阳，景色悲壮。画面的一旁题句为：七十二坟青草遍，更无人表汉将军。这些都表达了潘达微对为革命而牺牲的同志的眷恋之情。

1912年1月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南京诞生。当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没有忘记曾经为之奋斗的革命先烈。5月15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起义一周年，广州、南京、北京都举行了纪念活动。黄兴撰写挽联：

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  
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

此联以“碧血”和“黄花”并用，浑然一体，十分凝练。碧血赋性坚贞，血化为碧，显示刚强气节；黄花专指菊花，傲霜风骨，象征着革命烈士的精

神。从此，“碧血黄花”便成为形容黄花岗的一个专有词。

1911年11月，广州宣告独立，广东军政府着手准备为黄花七十二烈士修墓，后因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建墓工作停顿。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次年，驻防广州的滇军师长，方声洞烈士的哥哥方声涛，再次倡议为烈士修墓。1919年，在烈士殉难八周年的时候，七十二烈士墓初步修成。这年的秋天，墓地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扩建。将原来平面正方形的墓顶，改建成立体梯形，在顶端增建了墓亭，亭内树立着墓碑，《七十二烈士之墓》为方声涛所书。墓亭的顶部是一座大钟，它隐寓着烈士们在起义中为辛亥革命奏起了雄壮的序曲，为苦难的中国人民敲响了民主、自由的钟声。

墓亭的后面是纪功坊。它是由孙中山和林森发起，海外华侨捐款修建的。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为纪功坊篆额：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坊墙正面镌刻着孙中山手书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纪功坊顶层上面，是一个用七十二块大小相等的长方形石头垒砌，底宽顶狭。两面成梯形的“献石堆”，象征着巍然屹立的七十二位烈士。它的顶部是一座石雕的自由神像。

1924年2月，广东大元帅府大本营发布布告，规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及其周围共二百余亩土地，划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坟园”的范围。1935年又建立了正门。从此，建筑雄伟、规模宏大的黄花岗烈士陵园基本建成。

1925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以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为黄花岗烈士殉难纪念日。

当年亲手安葬烈士的潘达微，对烈士追念不已，1925年9月，在菊花盛开的季节，写下了《秋菊》诗：

一夜秋风起，黄花照眼明。

莫愁霜露冷，好梦是凄清。

1927年，烈士殉难二十六周年之际，他又题一首《黄菊红棉图》诗，其中有“吾粤两般千古事，黄花开后又红花”，寄托他对烈士的无限怀念。

年年黄花节，绵绵缅怀情。对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先烈，永志不忘。

